

# 从语言文化视角看支那、China、Sino等词的历史渊源与现状

作者：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 高朝阳

**【摘要】**语言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的映射。关于中国的名称，在古代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称呼。“支那”作为古代中国称呼的一种，却在近代有了另外的涵义。本文试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分析支那、China、Sino等词的历史渊源与现状。

**【关键词】**语言；文化 支那 China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的词汇都或多或少带有历史文化痕迹。历史上关于中国的名称问题，特别是其它国家对于中国的称呼，一直都是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热衷研究的热点。关于中国的称呼问题在古代一直没有一个固定明确的概念。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称呼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过多种不同或相近的名字：比如Sino、China、Cina（梵语）、支那、契丹等等。关于这些称呼有的看似相近，有些却又大有差异。这些都是在一一定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度对中华名族的称呼，无论那个称呼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但只有“支那”这个称呼令国人非常厌恶。根据语言的双重约束与单项冲突的文化背景原则“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可能随时随地要么违背会话原则，要么违背社会准则。当两者冲突时会话准则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的强迫，而对社会准则的冒犯却能激起更大的道德上的愤怒和非难，人们经常会对这种非难摇头或皱眉头。”而国人对于“支那”一词的反感和厌恶告诉我们这种准则确实在起作用。那么为什么偏偏对于这一称呼反感呢？本文就这一问题以及相关词汇的历史渊源和现状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

##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关于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传统语言学沿用索绪尔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20世纪后半期语言研究的成果大大超越了传统语言观的论断，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行为。换言之，语言不仅体现并反映了社会，而且能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对社会生产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时候是积极的有些时候却又是消极的。当代语言观认为，与所有的社会行为一样，使用语言受到社会准则的制约。“支那”一词的使用忌讳就是由于这种社会文化准则在起作用。美国电视台CBS曾经在电视节目中称呼中国篮球明星姚明“支那人”，引起华人的强烈不满而一致要求其道歉，最后在该电视台致歉后此事才告以终结。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产生呢？这需要我们深入了解这些词汇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发展演变过程。

## 二、中国在历史上的名称问题

正如西方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国家名称则是其历史的符号，它的所指与能指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直接相关。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民国以前中国是家天下的



历史，历代王朝都是以王朝名称称呼自己。至于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则由于语系不同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斯拉夫语系即现在的俄语称呼中国为 KHTa，意为“契丹”(Khitan)。这是由于俄国人把中国人与契丹民族混在一起。中国人与契丹人同属于黄色人种。契丹人较早与罗斯人发生交往，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契丹是 10 世纪之初兴起于中国辽东之北的民族，公元 1125 年，被女真人所灭。虽然契丹人存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这一段时间恰好是古代罗斯人建立自己公国的时代，根据俄国著名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等的记载，这一时期正是古代基辅公国等斯拉夫国家兴起的时代。罗斯人最早接触的是契丹人，也就把中国人看成是契丹民族。在这种历史接触中，是斯拉夫语言使得中国名称固定为“契丹”的读音。第二、古代印度人和欧洲人则采取的是另外一种称呼，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支那”、China、Sino 等。今天的汉语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语“Cinasthana”、或“Mahachinasthana”之说也早已获得了公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称呼中国，梵语和印欧语系对于中国的称呼实际上是来自两个方向，都在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上，学者们根据历史接触来研究，往往不能确定其来源方向之间的关系。这两个语系在 19 世纪之后被欧洲的比较语言学家发现是属于同一语系，这就为中国之名的历史索解提供了关键的条件。而希拉词根 Sino 表示中国则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后才流行起来的，当时把那场战争译为 Sino-Japanese War 再比如中美关系英文译作 Sino-US Relationship、Sino-Euro 为中欧、中国石油叫做 SINOPEC。关于汉语“支那”的称呼其实早在中国唐代就已经有了，唐代高僧玄奘从西天印度取经回来之后，支那一词也就随着经文的翻译出现在汉语中，只是用字不一致而已。据钱文钟教授在百家讲坛中的讲述，古代印度也即梵语对中国的这一称呼早已有之，他还介绍说印度梵语中把桃子叫做“支那蜜”即从“支那国”传来的像蜜汁一样香甜的水果。然而，古代国人对支那的称呼好像一直并不怎么热衷，只有在佛教的经文中出现而已。但必须指出古代对于中国的这一称呼并不存在什么蔑称。

### 三、忌讳的产生

说到忌讳的产生就不能不提及日本了。在历史上日本从来视中国为其学习的楷模，这与日本的民族个性喜欢学习强者、崇拜强者有很大的关系。古代日本无论是从文化艺术，还是从宗教文字等各个方面都在积极的效仿中国。古代日本人使用“支那”一词称谓中国的语境和习惯与中国非常相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日本人认同古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的结果。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东方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对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对中华文明怀有深厚的敬仰之情，仰慕中华文化。隋唐时代日本曾专门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日本使臣、僧人也纷纷来中国学习。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文化交流的范围涉及各个领域。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讲：“一千几百年来，日本从中国接受了文化上的恩惠与影响：汉字不必说，其他在思想、文学艺术、历法、官制、医道、乃至衣食住各个部分和生产技术工具方面，都可以见到中国的影响。所以，过去日本人对中国、中国人的尊敬概念是很强的。”可见古代日本无论官方和民间对中国称“支那”只是其对中国众多称呼中的一种，并且在当时绝无歧视、蔑视的涵义，相反是一种尊敬的称呼。关于支那一词贬义的产生则要从近代说起，清朝末期处于亚洲的中国和日本无论在经济还是在实力上都是西方列强欺凌的对象，而日本由于“明治维新”学习西方而日渐强大，日本民族对于中国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崇拜了。近代日本对于中国支那的称呼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在清朝末期华工在美国的遭遇是很悲惨的，大强度的劳动并没有为他们赢得任何的尊重，相反当时的美国人对华工是相当蔑视的。动不动就以支那人称呼。在当时的美国还有一句俗语：“支那人的机会”表示完全没有机会。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西方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名称的蔑视。当时的日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习西方的，支那一词在日本早已有之，然而由于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了



解的西方对于 Chinese 等词的蔑视性涵义。加上 China 和支那又是谐音，从此对中国的称呼也就有以前的清国、唐等转而变成支那了。加上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一批有影响的政论家、学者对“支那”一词的使用，对日本人使用“支那”一词称谓中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此以后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无论是从官方还是民间就基本用支那一词了。而中国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不认同这一称呼，据史料记载：一九三〇年，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对于这一称呼并不认同，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支那一词无论是在日本官方还是在民间都没有改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的严正要求下，日本对于中国支那的称呼才算真正的结束。从以上历史记载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支那一词本身并没有任何过错，它还是中国的某个时代由中国传入印度的梵语进而传入到全世界的，支那一词传入日本则是随着中国佛教一起进入日本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词汇的基本文化内涵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和政府都不认同这一称呼的主要原因。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也曾提出语言与意识形态的这一关系。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某种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名称问题是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名称的变化也是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干扰。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受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也曾对中原地区以外的民族用过蔑视或歧视性的称呼，比如‘匈奴’‘蛮’‘夷’等，我们从汉字的造字角度就可以很明白的看出这些词的含义。例如对日本的称呼在历史上我们民间或官方也曾用过‘倭奴’‘小日本’‘日本鬼子’等。这些都是受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人们总是倾向于用它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们所观察达到文化，他们常常把那些与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相矛盾的习惯和信仰视为落后和野蛮的。在美国以前对于黑人的称呼用 Black People、Negro 等词汇，然而现在这一称呼基本上不在使用而改用 African-American 更为中性的词汇。可见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称呼并不仅是一个名称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尊重。

#### 【参考文献】

- [1] 方汉文. 关于“支那”名称的来源.[J].寻根, 2003 年第二期 51-53.
- [2] 杨爱芹. 日本官、民使用“支那”一词的特点及原因分析[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7.11: 118-121.
- [3] 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8-59.
- [4] 赵起. 语言的双重约束与单项冲突的文化背景[J].西安.英语学科研究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265-266.
- [5] 左焕琪. 外语教育展望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01: 9-10.

#### 【作者简介】

高朝阳（1980—），陕西礼泉人，男，四川大学在读硕士，四川攀枝花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中西语言文化、外语教育。

